

基于主客体互倚探索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寇鑫¹, 张哲², 侯攀登¹, 宋国萍^{3*}

(1.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信阳 464000; 2. 西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西安 710048; 3.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西安 710061)

摘要: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研究旨在探讨夫妻工作资源对自身及配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神经质的调节作用。采用工作资源量表、婚姻满意度量表以及神经质量表问卷对318对双收入夫妻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丈夫和妻子的工作资源均能正向预测自身的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均显著;(2)丈夫的工作资源能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客体效应显著;而妻子的工作资源不能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的客体效应不显著;(3)妻子的神经质水平对妻子工作资源与其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主体效应起调节作用;丈夫的神经质水平对丈夫的工作资源与妻子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客体效应起调节作用。因此,在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主客体互倚模型中,丈夫的成对模式为主体模式,妻子的成对模式为对偶模式,且神经质在部分主客体效应中存在调节作用。

关键词:婚姻满意度;工作资源;神经质;主客体互倚模型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6-0521-09

1 问题提出

民政部《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依法办理离婚手续287.9万对,比上年增长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2)。持续下降的结婚率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引起社会对婚姻的关注。婚姻不仅影响着个人生活,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婚姻满意度是衡量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也是个体对自己婚姻状况作出的主观评价(Fowers & Olson, 1993)。有研究指出,工作和家庭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领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能局限于家庭领域探讨婚姻的影响因素(Lavner & Clark, 2017)。确实有研究发现,当工作领域渗透到家庭领域时,婚姻生活会受到一定影响(Chen et al., 2020)。个体在工作中感受到过多的压力,会导致较低的婚姻满意度,也可能会对个体非工作时间内的情绪体验产生负面影响(Radic et al., 2020)。因此,探讨工作领域对家庭领域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但是国内的研究更多对婚姻关系中的个体进行研究,而较少探讨夫妻之间的相互影响。国外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自身的婚姻

满意度,以及其配偶的婚姻满意度(van Steenbergen et al., 2014)。从现实因素出发,有必要将婚姻关系中的夫妻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夫妻之间的影响机制。而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是分析成对数据关系的方法(Kenny & Ledermann, 2010),可用于工作-家庭领域成对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将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聚焦夫妻双方工作领域中的因素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1.1 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

溢出-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为探讨工作-家庭领域提供了很好的视角(Bakker et al., 2009)。该理论包含两种影响机制(Westman, 2001)。其一是溢出机制,是指个体在一个领域(如,工作)中感受的压力传递到另一个领域(如,家庭),强调个体内部跨领域的传递。研究表明,工作领域中的压力会蔓延到家庭领域,并导致家庭领域的压力增加,同时,家庭中的压力也会对个体工作中体验到的幸福感产生负性影响(Lavner & Clark, 2017)。其二是交叉机制,是指一个个体在工作或家庭中感受的压力传递给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另一个个体,强调个体之间的传递。以往研究证实了焦

* 通信作者:宋国萍, E-mail: gongsong@126.com。

虑、抑郁和工作倦怠在有密切关系的个体之间的交叉传递(Bakker et al., 2011)。近几年,学者开始关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交叉传递,提出了积极溢出-交叉模型(Positive Spillover - Crossover Model)。该模型探讨个体在一个领域获得的资源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溢出到另一个领域,并通过社会交互影响到夫妻双方的幸福感。这一模型已得到了初步的检验和支持(谢菊兰等,2017)。工作资源是指工作中有利于减少工作需求、与工作成本密切相关的资源,促进工作目标的完成,而且能激励个体的成长和发展(Bakker & Demerouti, 2007)。Radic 等人(2020)以邮轮员工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工作资源对工作投入和幸福感都有积极影响,员工在工作中获得的能量或者新的技能使他们更容易完成家庭角色,这些工作经历进一步促进婚姻关系。同时,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积极的交叉传递得到了证实(van Steenbergen et al., 2014; 谢菊兰等,2017)。据此,本研究假设 1:个体工作资源会影响自身及配偶的婚姻满意度。

1.2 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人格特质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Yu et al., 2020)。神经质是一种与负性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神经质水平越高,个体的情绪稳定性越低,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困扰(Widiger & Oltmanns, 2017)。研究表明,神经质对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一项基于 19 个样本、3848 名被试的元分析结果显示,低神经质与夫妻间亲密关系的满意度显著相关,并且个体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感知会受到配偶神经质水平的影响(Malouff et al., 2010)。

而且,妻子神经质的变化与其自身的婚姻满意度和丈夫的婚姻满意度的变化均呈负相关(Lavner et al., 2018)。可见,神经质影响着个体自身及其配偶的婚姻满意度。神经质被视为人格特征中对婚姻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张静,2021),影响着夫妻之间的表达方式,如高神经质的人更倾向批评性、蔑视性和防御性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会破坏夫妻间的亲密关系(Malouff et al., 2010)。人格特质在工作资源对幸福感及其他相关结果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Bakker et al., 2023)。神经质也影响着个体如何理解工作表现和如何看待组织行为,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工作倦怠,因为他们倾向于关注生活的消极情境,并经常回忆负面信息

(Swider & Zimmerman, 2010)。而这种消极的体验容易蔓延到生活领域,影响着婚姻生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夫妻双方神经质在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夫妻间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主客体互倚模型,并检验神经质的调节效应(图 1)。具体如下:探讨(1)自变量对个体因变量的影响(主体效应),即:工作资源对自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2)二元关系中特定客体自变量对个体因变量的影响(客体效应),即:工作资源对配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3)个体及配偶的神经质在主客体效应之间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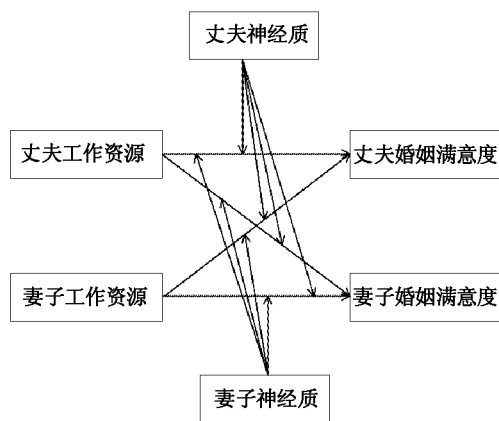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陕西、内蒙古、浙江、广东等地的 385 对双收入夫妻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 318 份,有效率为 82.60%。其中,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38.92 岁($SD = 7.66$),妻子的平均年龄为 37.45 岁($SD = 7.52$)。30.50% 夫妻的婚龄为 1~5 年,26.42% 夫妻的婚龄为 6~10 年,22.64% 夫妻的婚龄为 11~20 年,20.44% 夫妻的婚龄为 21 年以上。84.91% 妻子和 81.13% 丈夫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

2.2 研究工具

2.2.1 工作资源

采用 Bakker 等人(2004)开发的工作资源量表,并由韦志飞(2013)进行修订和验证,该量表包含 13 个题目,分为社会支持、工作控制感和工作发展机会三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7(丈夫)和 0.89(妻子)。

2.2.2 婚姻满意度

采用 Fowers 和 Olson(1993)编制的,汪向东等人(1999)翻译修订的婚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婚姻满意度。该量表包括 10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9(丈夫)和 0.87(妻子)。

2.2.3 神经质

“大五”人格量表采用 Costa 和 McCrae 编制的简式人格问卷(NEO-FFI)中神经质部分,包含 12 个题目。该量表在华人地区试用结果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佟丽君,周春霖,2009)。采用 5 点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7(丈夫)和 0.85(妻子)。

2.3 研究程序 and 数据处理

研究在心理学研究生协助下完成,通过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进行。将成对编码后的问卷,分别发放或推送给夫妻双方,并告知被试需独立完成,完成后进行回收。只有夫妻双方均有效时,样本才有效。问卷上已说明研究的意义以及相应要

求,研究并未支付任何报酬。

采用 SPSS 24.0 和 Mplus 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对丈夫和妻子报告的项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报告的数据中分别有 8 个和 9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18.83% 和 19.50%,均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结果表明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丈夫的工作资源与自身以及配偶的婚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妻子的工作资源与自身的婚姻满意度呈正相关;配偶之间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丈夫神经质与丈夫工作资源、丈夫婚姻满意度、妻子婚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妻子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妻子神经质与妻子工作资源、妻子婚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研究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318)

变量	<i>M</i> ± <i>SD</i>	1	2	3	4	5	6
1. HWR	3.62 ± 0.56	1					
2. WWR	3.53 ± 0.61	0.19**	1				
3. HMS	3.54 ± 0.65	0.25**	0.08	1			
4. WMS	3.49 ± 0.64	0.18**	0.26**	0.49**	1		
5. HNEU	2.90 ± 0.67	-0.22**	0.03	-0.16**	-0.17**	1	
6. WNEU	2.79 ± 0.63	-0.08	-0.22**	-0.08	-0.24**	0.14*	1

注:HWR 为丈夫工作资源;WWR 为妻子工作资源;HMS 为丈夫婚姻满意度;WMS 为妻子婚姻满意度;HNEU 为丈夫神经质;WNEU 为妻子神经质,* $p < 0.05$,** $p < 0.01$,下同。

3.3 工作资源对个体以及配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性模型,该模型由 Kenny 和 Ledermann(2010)提出,包括主体模式、客体模式、对偶模式和对比模式四种模型,通过客体效应与主体效应比值 k 来判断模式类型。用结构方程构建 APIM,在结果中可直接得到 k 值及其 bootstrap 置信区间。在得到 k 值前,研究还需先确定成对数据类型。成对数据将分为可区分和不可区分两种。

第一步,估计饱和模型。该模型卡方和自由度均为零。Kenny 和 Ledermann(2010)建议使用非标准化系数,结果见图 2。(1)丈夫的工作资源能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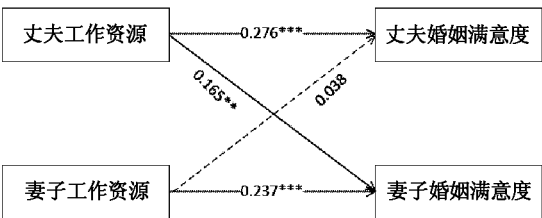


图 2 饱和模型结果

正向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工作资源能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均显著;(2)丈夫的工作资源能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客体效应显著;而妻子的工作资源不能显著预测

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的客体效应不显著。

第二步,检验成对关系。研究同时限制夫妻主体效应相等、客体效应相等,进一步分析卡方值变化是否显著。如果卡方值变化显著,则将其视为可区分成对关系;反之,则为不可区分成对数据。Kenny 和 Ledermann(2010)建议较为宽松的显著性水平,如 0.2。经检验, $\chi^2(2) = 12.94, p = 0.00 < 0.20$,表示夫妻间成对数据为可区分的成对关系。

第三步,检验两个 k 值。研究饱和模型结果符合主体效应绝对值均大于 0.1 的要求,在 APIM 模型中加入幽灵变量,来估计 k 值。并通过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置信区间估计。经检验,丈夫的 k 值等于 0.14,95% CI 为 $[-0.26, 0.61]$,置信区间包含 0,表示丈夫的成对模式可能为主体模式。妻子的 k 值等于 0.70,95% CI 为 $[0.12, 2.25]$,置信区间包含 1,表示妻子的成对模式可能为对偶模式。

为了进一步检验丈夫和妻子的成对模式,分别限制丈夫的 k 值等于 0、妻子的 k 值等于 1。模型的卡方值变化不显著, $\chi^2(2) = 0.81, p = 0.67$ 。同时,限制 k 值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CFI = 1.00,TLI = 1.00,RMSEA = 0.00。该结果支持了丈夫的成对模式为主体模式,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主要受丈夫的工作资源影响;而妻子的成对模式为对偶模式,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同等地受妻子工作资源影响及丈夫工作资源影响。

3.4 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调节效应模型(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ration Model, API-MoM),检验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主体效应是否受神经质调节变量的影响。调节变量分为对子内调节变量、对子间调节变量和混合型调节变量(Garcia et al., 2014)。研究的调节变量为混合型调节变量,对子内和对子间变量均不同,即丈夫的神经质和妻子的神经质。

研究采用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 MLM)实现。MLM 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分析(陈莎等, 2020),分三步:第一步,对个体自身及配偶的工作资源和神经质进行中心化处理;第二步,采用互动方法模型分析 API-MoM 中主客体效应是否会受到个体自身及配偶神经质的调节;第三步,采用二截距模型进一步分析每个对子中夫妻间主客体效应的大小。

用性别 G 、神经质 M 及配偶的神经质 M' 作为

调节变量,工作资源为 X ,配偶的工作资源为 X' ,婚姻满意度为 Y ,则第 j 个对子中的个体 i 的预测方程表示为:

$$Y_{ij} = b_0 + b_1X_{ij} + b_2X'_{ij} + b_3M_{ij} + b_4M'_{ij} + b_5G_{ij} + b_6X_{ij}M_{ij} + b_7X_{ij}M'_{ij} + b_8X'_{ij}M_{ij} + b_9X'_{ij}M'_{ij} + b_{10}X_{ij}G_{ij} + b_{11}X'_{ij}G_{ij} + b_{12}M_{ij}G_{ij} + b_{13}M'_{ij}G_{ij} + b_{14}X_{ij}M_{ij}G_{ij} + b_{15}X_{ij}M'_{ij}G_{ij} + b_{16}X'_{ij}M_{ij}G_{ij} + b_{17}X'_{ij}M'_{ij}G_{ij} + e_{ij}$$

b_0 是截距, b_1 是 X_{ij} 作用于 Y_{ij} 的系数(主体效应), b_2 是 X'_{ij} 作用于 Y_{ij} 的系数(客体效应), b_3 是 M_{ij} 作用于 Y_{ij} 的系数; b_4 是 M'_{ij} 作用于 Y_{ij} 的系数; b_5 是性别在 Y_{ij} 的差异; b_6 是主体变量与神经质的交互项的系数; b_7 是主体变量与配偶神经质的交互项的系数; b_8 是客体变量与神经质的交互项的系数; b_9 是客体变量与配偶神经质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0} 是主体变量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1} 是客体变量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2} 是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3} 是配偶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4} 是主体变量、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5} 是主体变量、配偶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6} 是客体变量、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b_{17} 是客体变量、配偶神经质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 e_{ij} 是残差项。

为了进一步了解丈夫和妻子的神经质分别对丈夫和妻子的主客体效应大小,建立二截距模型分别分析丈夫和妻子的主客体效应:

$$Y_{ij} = b_1H_i + b_2W_i + b_3X_{ij}H_i + b_4X_{ij}W_i + b_5X'_{ij}H_i + b_6X'_{ij}W_i + b_7M_{ij}H_i + b_8M_{ij}W_i + b_9M'_{ij}H_i + b_{10}M'_{ij}W_i + b_{11}X_{ij}M_{ij}H_i + b_{12}X_{ij}M_{ij}W_i + b_{13}X_{ij}M'_{ij}H_i + b_{14}X_{ij}M'_{ij}W_i + b_{15}X'_{ij}M_{ij}H_i + b_{16}X'_{ij}M_{ij}W_i + b_{17}X'_{ij}M'_{ij}H_i + b_{18}X'_{ij}M'_{ij}W_i$$

H_i 和 W_i 分别是丈夫和妻子的两个哑变量。

互动方法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神经质水平调节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6 = 0.14, SE = 0.06, t = 2.32, p = 0.02, 95\% CI$ 为 $[0.02, 0.26]$),但无法调节配偶的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8 = -0.02, SE = 0.07, t = -0.23, p = 0.82, 95\% CI$ 为 $[-0.15, 0.12]$)。配偶的神经质水平调节了配偶的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9 = 0.16, SE = 0.06, t = 2.73, p = 0.01, 95\% CI$ 为 $[0.05, 0.28]$),但无法调节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7 = -0.06, SE = 0.07, t = -0.81, p = 0.42, 95\% CI$ 为 $[-0.19, 0.08]$)。性别和个体

神经质交互、性别和配偶神经质交互均无法调节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以及配偶的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如表2)。

表2 神经质调节变量互动方法模型结果

参数	<i>b</i>	<i>SE</i>	<i>t</i>	<i>p</i>
截距	3.54	0.03	139.95	0.00
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主体效应	0.22	0.04	5.11	0.00
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主体效应	0.07	0.04	1.69	0.09
NEU	-0.14	0.04	-3.67	0.00
PNEU	-0.08	0.04	-2.00	0.05
性别	-0.02	0.03	-0.64	0.52
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14	0.06	2.32	0.02
P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6	0.07	-0.81	0.42
NEU 对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2	0.07	-0.23	0.82
PNEU 对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16	0.06	2.73	0.01
性别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3	0.04	-0.60	0.55
性别对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4	0.04	0.95	0.35
性别和 NEU 的交互效应	-0.05	0.04	-1.16	0.25
性别和 PNEU 的交互效应	-0.03	0.04	-0.74	0.46
性别和 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4	0.06	0.64	0.52
性别和 P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5	0.07	-0.71	0.48
性别和 NEU 对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10	0.07	1.41	0.16
性别和 PNEU 对配偶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0.06	0.06	0.93	0.36

注:NEU 为个体神经质,PNEU 为配偶神经质,下同。

二截距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丈夫神经质水平无法调节丈夫工作资源对丈夫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1} = 0.10, SE = 0.09, t = 1.12, p = 0.26, 95\% CI$ 为 $[-0.75, 0.28]$)、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4} = -0.10, SE = 0.08, t = -1.23, p = 0.22, 95\% CI$ 为 $[-0.27, 0.06]$)以及妻子工作资源对丈夫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5} = -0.11, SE = 0.09, t = -1.25, p = 0.21, 95\% CI$ 为 $[-0.28, 0.06]$)。

妻子神经质水平调节了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2} = 0.18, SE = 0.08, t = 2.23, p = 0.03, 95\% CI$ 为 $[0.02, 0.33]$),但无法调节丈夫工作资源对丈夫婚姻满意度主体效

应的预测作用($b_{13} = -0.01, SE = 0.11, t = -0.07, p = 0.95, 95\% CI$ 为 $[-0.22, 0.20]$)以及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6} = 0.08, SE = 0.10, t = 0.79, p = 0.43, 95\% CI$ 为 $[-0.12, 0.23]$)。

但是,丈夫神经质水平调节了丈夫的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8} = 0.22, SE = 0.09, t = 2.55, p = 0.01, 95\% CI$ 为 $[0.05, 0.39]$),而妻子的神经质水平无法调节妻子的工作资源对丈夫婚姻满意度客体效应的预测作用($b_{17} = 0.11, SE = 0.08, t = 1.29, p = 0.20, 95\% CI$ 为 $[-0.06, 0.27]$)(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神经质调节变量二截距模型结果

参数	<i>b</i>	<i>SE</i>	<i>t</i>	<i>p</i>
截距				
丈夫	3.56	0.04	97.16	0.00
妻子	3.53	0.03	100.92	0.00
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的主体效应				
丈夫	0.24	0.07	3.73	0.00
妻子	0.19	0.05	3.51	0.00
配偶的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的客体效应				
丈夫	0.03	0.06	0.55	0.58

续表 3

参数	<i>b</i>	<i>SE</i>	<i>t</i>	<i>p</i>
妻子	0.11	0.06	1.79	0.07
NEU				
丈夫	-0.10	0.05	-1.78	0.08
妻子	-0.19	0.06	-3.40	0.00
PNEU				
丈夫	0.05	0.06	-0.85	0.40
妻子	-0.11	0.05	-2.05	0.04
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丈夫	0.10	0.09	1.12	0.26
妻子	0.18	0.08	2.23	0.03
PNEU 对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丈夫	-0.01	0.11	-0.07	0.95
妻子	-0.10	0.08	-1.23	0.22
NEU 对配偶的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丈夫	-0.11	0.09	-1.25	0.21
妻子	0.08	0.10	0.79	0.43
PNEU 对配偶的工作资源→婚姻满意度的调节效应				
丈夫	0.11	0.08	1.29	0.20
妻子	0.22	0.09	2.55	0.01

妻子工作资源与妻子神经质交互效应方面,研究将妻子神经质划分为低分组(平均数-1标准差)、高分组(平均数+1标准差)两个水平,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妻子神经质水平较低时,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预测不显著($B_{simple} = 0.12, SE = 0.08, p > 0.05$);当妻子神经质水平较高,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预测显著($B_{simple} = 0.32, SE = 0.07, p < 0.001$)(详见图3)。

丈夫工作资源与丈夫神经质的交互效应方面,将丈夫神经质划分为低分组(平均数-1标准差)、高分组(平均数+1标准差)两个水平,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丈夫神经质水平较低时,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预测不显著($B_{simple} = 0.04, SE = 0.09, p > 0.05$);当丈夫神经质水平较高,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预测显著($B_{simple} = 0.30, SE = 0.08, p < 0.001$)(详见图4)。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了夫妻之间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证实了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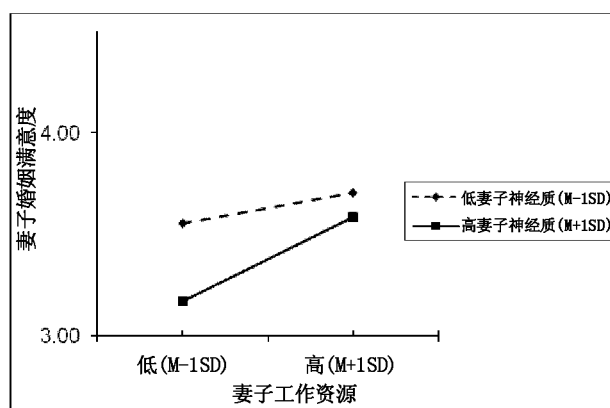


图3 妻子神经质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简单调节作用图

溢出-交叉传递机制,并进一步探究神经质在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主体效应方面,研究证实了工作领域到家庭领域传递的积极溢出机制,丈夫(或妻子)在工作领域获得的资源传递到家庭领域,促进了丈夫(或妻子)婚姻满意度水平的提升。这一发现与 Sanz - Vergel 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个体在工作中的活力会对其生活中幸福感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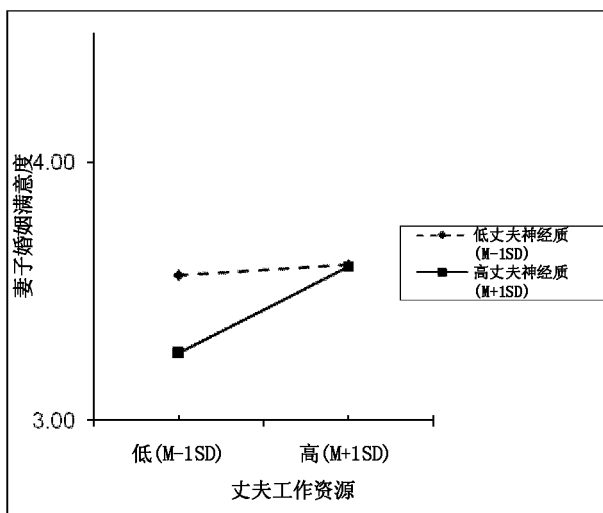


图4 丈夫神经质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简单调节作用图

(Hobfoll, 1989), 资源的获得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机制。工作中获得的资源可能创造一个“获得螺旋”, 促进工作-家庭增益, 从而提高个体的婚姻满意度 (van Steenbergen et al., 2014)。在工作中获得的资源能够让个体产生乐观积极的人生观, 增强个人成就感, 更乐于投入家庭生活当中, 提升家庭生活中的表现 (Aw et al., 2020)。

客体效应方面, 研究部分证实了工作领域到家庭领域的积极交叉传递机制。丈夫在工作领域获得的资源传递到家庭领域, 促进了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水平的提升, 证实了丈夫工作资源到妻子家庭领域的交叉传递; 而妻子在工作领域获得的资源传递到家庭领域, 未显著影响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水平, 未证实妻子的工作资源到丈夫家庭领域的交叉传递。可见, 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强于妻子工作资源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夫妻之间的差异也符合 Westman (2001) 提出的观点, 与丈夫相比, 妻子更容易受到交叉传递的影响。该观点在后续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丈夫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增益会影响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升, 但是并没有发现妻子工作家庭增益与丈夫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交叉传递 (van Steenbergen et al., 2014)。交叉传递过程中, 妻子更容易受到交叉传递的影响, 其原因可能为: ①妻子更加敏感, 有着更强的共情能力 (谢菊兰等, 2017), 容易感知到丈夫的积极表现, 而丈夫的共情能力相对较弱, 在婚姻生活中受妻子情绪影响也较小。②丈夫和妻子可能看待工作资源的视角不同。丈夫倾向认为妻子主导家庭生活, 对妻子工作资源的获得关注较少, 其婚姻满意度的感

知较少受妻子工作资源的影响。而妻子可能同时关注自身和配偶工作中的表现, 如丈夫在工作中是否有自主权、提升空间等, 因此, 其婚姻中满意度的感知受丈夫工作资源的影响。研究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了解工作资源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夫妻之间的传递。

神经质调节效应方面, 妻子的神经质水平对妻子的工作资源与妻子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主体效应起调节作用。随着妻子神经质水平的升高, 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神经质水平较低的妻子, 其情绪状态相对稳定, 受工作中所获得资源的影响较小, 工作资源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可能将压力事件视作一种威胁或者挑战, 加剧了消极情绪反应 (张兴慧等, 2019)。神经质水平较高的妻子, 面对工作资源较少时, 表现得更加焦虑、局促、紧张, 进一步放大了负性情绪 (Swider & Zimmerman, 2010), 这种影响会蔓延到家庭生活, 进而导致其婚姻满意度水平的降低; 面对工作资源较多时, 并未觉得受到威胁, 反而能够感知工作资源带来的积极影响。

丈夫的神经质水平对丈夫的工作资源与妻子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客体效应起调节作用。随着丈夫神经质水平的升高, 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神经质是个体体验和表达情绪倾向性的人格特质 (Malouff et al., 2010), 影响着个体亲密关系中的体验 (张静, 2021)。神经质水平较低的丈夫, 无论在工作中获得的资源多少, 在夫妻关系中都能够给妻子带来积极的体验, 从而使妻子获得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而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丈夫, 易受环境的影响, 当工作中获得较少工作资源时, 可能会表现出冲动、恐慌、易怒等, 并将这种负性的体验传递给妻子, 从而降低了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水平。

研究探讨了夫妻间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机制, 进一步拓展了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丰富了工作-家庭领域直接传递的实证研究。同时, 研究是国内首次运用 APIMoM 同时检验丈夫与妻子的神经质在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 阐述了人格特征对夫妻间传递的影响。此外, 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双收入家庭已成为常态, 研究结果启示工作领域的有益结果有利于婚姻生活, 同时妻子的婚姻生活更易受丈夫工作中有益结果的影响; 其二,

稳定的情绪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个体和配偶促进和谐的夫妻关系,而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丈夫,在工作资源较少时,家庭成员和所在组织可考虑给与支持、理解与关注,从而减少对妻子婚姻生活的冲击。

研究存在着以下局限:①工作资源是动态变化的,研究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后续研究可考虑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取样,进一步探讨动态的工作资源对家庭生活的影响。②样本取样有一定局限性,后续可考虑从多省市采样,提高结果的推广性。

研究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了夫妻之间工作资源对婚姻满意度的主客体效应,证实了积极溢出-交叉传递机制,并进一步探究神经质这一人格特质在工作资源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在理论模型拓展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对于理解工作资源的积极影响在婚姻生活中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为婚姻关系的研究和干预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参考。

5 结论

丈夫和妻子的工作资源均能正向预测自身的婚姻满意度,主体效应均显著。丈夫的工作资源能预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客体效应显著;而妻子的工作资源不能预测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的客体效应不显著。同时,研究表明神经质在部分主客体效应中存在调节作用。随着妻子神经质水平的升高,妻子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随着丈夫神经质水平的升高,丈夫工作资源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

参考文献

- 陈莎,阳庆玲,邱佳玲,范潇茹,何娟,范雄智,等.(2020). 成对数据的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与SPSS软件实现. *现代预防医学*, 47(20), 3653-3659.
- 佟丽君,周春淼.(2009). 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五人格的调节作用检验. *心理科学*, 32(3), 604-606.
-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pp. 153-159).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 韦志飞.(2013). *工作资源、知识共享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大学.
- 谢菊兰,马红宇,唐汉瑛,姜海.(2017).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心理学报*, 49(3), 359-369.
- 张静.(2021). 关系自我扩展对大学生恋爱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一般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和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 146-155.
- 张兴慧,罗玉晗,玄新,王耕.(2019). 日常生活事件与高中生日常情绪体验的多层分析: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7(3), 348-353.
- 周浩,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2). 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79995221/attr/306352.pdf>
- Aw, S. S., Ilies, R., Li, X., Bakker, A. B., & Liu, X. Y. (2020). Work-related helping and family functioning: A work-home resourc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94, 55-79.
- Bakker, A. B., Demerouti, E., & Verbeke, W. (2004). Using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to predict burnout and 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3(1), 83-104.
- Bakker, A. B., & Demerouti, E. (2007).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State of the art.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2, 309-328.
- Bakker, A. B., Demerouti, E., & Sanz-Vergel, A. (2023). Job Demands-Resources Theory: Ten Years Later.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0, 25-53.
- Bakker, A. B., Demerouti, E., & Burke, R. (2009). Workaholicism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 spillover-crossov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4, 23-33.
- Bakker, A. B., Shimazu, A., Demerouti, E., Shimada, K., & Kawakami, N. (2011). Crossover of Work Engagement Among Japanese Couples: Perspective Taking by Both Partn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6(1), 112-125.
- Chen, Z., Allen, T. D., & Hou, L. (2020). Mindfulness, empathetic concern, and work-family outcomes: A dyadic analysi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9, 103402.
- Fowers, B. J., & Olson, D. H. (1993). Enrich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 brief research and clinical too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7(2), 176-185.
- Garcia, R. L., Kenny, D. A., & Ledermann, T. (2014). Moderation i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1), 8-29.
-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513-524.
- Kenny, D. A., & Ledermann, T. (2010). Detecting, Measuring, and Testing Dyadic Patterns i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3), 359-366.

- Lavner, J. A. , & Clark, M. A. (2017). Workload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 time: Testing lagged spillover and crossover effects during the newlywed year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01, 67 – 76.
- Lavner, J. A. , Weiss, B. , Miller, J. D. , & Karney, B. R. (2018). Personality Change among Newlyweds: Patterns, Predictors, and Associations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 Tim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6), 1172 – 1185.
- Malouff, J. M. , Thorsteinsson, E. B. , Schutte, N. S. , Bhullar, N. , & Rooke, S. E. (2010). The Five –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intimate partners: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4, 124 – 127.
- Radic, A. , Arjona – Fuentes, J. M. , Ariza – Montes, A. , Han, H. , & Law, R. (2020). Job demands – job resources (JD – R) model, work engagement, and well – being of cruise ship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88, 102518.
- Sanz – Vergel, A. I. , & Rodríguez – Muñoz, A. (2013). The spillover and crossover of daily work enjoyment and well – being: A diary study among working couples.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9, 179 – 185.
- Swider, B. W. , & Zimmerman, R. D. (2010). Born to burnout: A meta – analytic path model of personality, job burnout, and work outcom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6, 487 – 506.
- vanSteenbergen, E. F. , Kluwer, E. S. , & Karney, B. R. (2014). Work – Family Enrichment, Work – Family Conflict,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 Dyadic Analysi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9(2), 182 – 194.
- Westman, M. (2001). Stress and strain crossover. *Human Relations*, 54, 557 – 591.
- Widiger, T. A. , & Oltmanns, J. R. (2017). Neuroticism is a fundamental domain of personality with enormou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World Psychiatry*, 16(2), 144 – 145.
- Yu, Y. , Wu, D. , Wang, J. M. , & Wang, Y. C. (2020). Dark personality, marital quality,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of Chinese couples: An 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4, 109689.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Work Resource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nalysis: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Neuroticism

Kou Xin¹, Zhang Zhe², Hou Pandeng¹, Song Guoping³

(1. Aviation Maintenance NCO School,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2.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3.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1)

Abstract: Based on 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resourc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coupl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uroticism. A total of 318 dyadic dual – earner couple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of Work Resources Scale,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nd Neuroticism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work resources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ow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the actor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 (2) The husband's work resources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wife's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the wife's partner effect was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wife's work resources didn't predict the husband's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the husband's partner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3) The wife's neuroticism moderated the actor effect between their work resourc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The husband's neuroticism moderated the partner effect between the husband's work resources and the wife's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all, among the 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nalysis between work resourc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husband's dyadic pattern was actor – only pattern, wife's dyadic pattern was couple pattern, and neuroticism played moderating roles in some actor – partner effects.

Key words: marital satisfaction; work resources; neuroticism; Actor –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